

全球智库半月谈

终极讽刺：中国是亚洲的“美国”吗？

美国的南海战略

应急储备安排：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设计

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序

建设新丝绸之路

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捍卫南海

本期编译

蔡云飞

高歌

郭楚

郭子睿

李想

李笑然

刘天培

刘兴坤

沈仲凯

苏丹

谢晨月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张文豪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张文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终极讽刺：中国是亚洲的“美国”吗？ 4

导读：东亚地区的领土纷争四起，作者认为这是中国野心膨胀的表现。而美国近年来插手东亚争端的程度有所升级。但在本文作者看来，美国应该向几个世纪前的英国学习，不应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维护和平，而不是挑起战争。

美国的南海战略 7

导读：本文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提出建议。作者认为，应当防止南海沦为中国后院。美国应当显示外交领导力，使用强势筹码，进行多边安全合作，以全球性眼光应对挑战，并明确美国的首要利益。

对克鲁格曼反对 TPP 的回应 8

导读：克鲁格曼反对 TPP 的观点如下：第一，TPP 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大回报，因为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已经很低；第二，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ISDS）旨在维护跨国公司的利益；第三，TPP 中的知识产权规定有利于制药公司，不利于亟需救命的穷人。本文认为这些批判值得商榷，并进行了一一回应。

全球治理

应急储备安排：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设计 10

导读：2014年7月15日，在巴西福塔雷萨举行的第六次峰会上金砖国家签署成立了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CRA)，并就其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及各金砖国家的影响展开讨论。商讨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 CRA 的治理架构，2) CRA 的可得资源，3) 当前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4) IMF 在现有体系中的作用，5) 当前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以及6) 未来 CRA 在克服这些缺陷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

重估产出缺口 14

导读：产出缺口，即潜在 GDP 和实际 GDP 之差，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非常重要的指标。然而潜在 GDP 只能靠估算，无法直接观察得到。不同的数据和方法会导致估算结果的不同，

因此潜在 GDP 的概念虽然清楚，但其数值未必准确。本文认为从历史数据来看，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产出缺口的修正幅度非常大，并且调整的大小和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动有关。这反映了目前估算方法很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17

导读：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和本世纪初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相比，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本专栏采用 120 个城市的抵押贷款数据，调查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中国的房价增长率丝毫不逊于发生泡沫之前的日本，但可观的收入增长和高房贷首付比例却支持着低收入家庭对房市的稳定参与。未来收入增长的高预期可能是房价收入比的关键驱动力，但这有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约翰·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 22

导读：纳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亚伯数学奖的得主，但是本文认为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大，仅限于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论和“讨价还价”理论。为此，本文简要介绍了这两个理论相关文献的写作背景。

经济政策

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序 26

导读：本文旨在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顺序以及这些政策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谨慎的、渐进的战略来发展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并控制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如下措施：资本账户开放主要集中于长期投资者和资本流入、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和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方面。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施行的政策，未来也应该继续实施。

建设新丝绸之路 28

导读：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美国和印度建设新丝绸之路的计划、背后不同的原因，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障碍。

避免资产泡沫需要统一方案 33

导读：负债融资增大了整个金融系统中资产价格波动的幅度，并且助长泡沫，因此有必要进行监管。尽管没有解决金融市场失灵的万灵药，本文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采用一个综合、连贯的宏观审慎方法加强系统的监管程度。

战略观察

卡特在“香格里拉论坛”捍卫南海36

导读：近期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中国在南沙的填海造岛和其他军事活动表示了担忧。美国拟将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实际介入，并与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加强合作。然而，美国区别对待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的填海造礁行为令人不得不再一次看到美的双重标准。

欧洲危机侵蚀欧盟对外政策38

导读：随着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四月份访问俄罗斯，作者指出欧盟面临的希腊债务危机和乌克兰问题等危机的可能会使欧盟内部对外政策的统一更加困难。

普京的阴晴不定40

导读：新俄罗斯计划被放弃、俄宣布和平时期的军人死亡数为国家秘密、谴责美国非法干涉国际足联内部事务，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反映了普京阴晴不定的战略考虑。在明斯克协议逐渐失色的前景下，乌克兰危机正处在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

本期智库介绍42

终极讽刺：中国是亚洲的“美国”吗？

Doug Bandow /文 李想/编译

导读：东亚地区的领土纷争四起，作者认为这是中国野心膨胀的表现。而美国近年来插手东亚争端的程度有所升级。但在本文作者看来，美国应该向几个世纪前的英国学习，不应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维护和平，而不是挑起战争。编译如下：

崛起中的国家总是自信满满，决心扩张。其在领土争端中不留商量的余地，认定领土归属不存在法律问题。这位国际秩序的新闯入者也对国际势力最强国构成了挑战，后者需要决定对千里之外的国家发起战争是否有必要。崛起国的领土要求是有点过分，但没人想看到历史冲突再次上演。

那是 1845 年，在得克萨斯从墨西哥脱离出来之后，美国将其纳入本国版图。华盛顿方面要求邻居给予默许，不仅是为了周边领土的合并，更是为了将领土边界扩张到盎格鲁定居区之外。美国在争议领土上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很快就迎来了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在处理美加边界的问题上也向英国表现出好战的态度，试图扩张俄勒冈边界。到了波尔克政府时期，其态度有所收敛，伦敦方面也适应了这个傲慢年轻的新国家，而这是为在曾经的敌人间发展“特别关系”的必要步骤。

今天，中国在东亚海域的行动异曲同工。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巨头，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也在增强，国际和区域秩序备受压力。因为控制岛屿可以得到资源所有权和海上优势，这促使中国对之前被认为不切实际或无用的领土宣誓主权。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领先，但不再有威慑力。中国则越来越独断，甚至可以说好战。东亚海域岛屿密布，包括钓鱼岛 / 尖阁诸岛，南沙群岛 / 斯普拉特利群岛，西沙群岛 / 帕拉塞尔群岛，黄岩岛 / 斯卡巴洛礁。中国宣称对这些岛屿均有主权，而与中国产生争端的国家有文莱、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

美国并不是争议双方之一，不过美国海军在中国 200 英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情报收集，中美在此问题上剑拔弩张。更重要的是，美国与日本建有正式的军事联盟，与马尼拉的军事关系相对更弱，但菲律宾方面正在寻求类似的领土安全保障。而美国也将自己视为缓解全球争端的主导者。奥巴马政府派遣美国空军进入中国宣称具有主权的岛屿，并与日本空军商讨联合巡逻事宜，这使得美国插手此事的程度有所升级。

但这些引起争端的言论都不值得触发战争。中国正使用切香肠战术，循序渐进地将整体切成许多小块，以避免冲突。但即使是为了整个大块头，又有谁真正愿意开战呢？大多数岛屿和小岛本身意义并不大，安全价值很低。领海权确实会受到影响，但在和平时期的影响并不大，而战争时期则一切依赖于海军的力量。

经济利益确实很强，但相对于大多数争议国的经济规模来说还是很小。和平友好地共同发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开发领土之下的油气能源。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真正关心的是国家尊严，而非法律细节。尽管大家官方措辞都认为应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但中国有明显的动机对军事行动跃跃欲试。中国现在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实力能与日本媲美并远超其他纠纷国。

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呢？国内外都有压力希望美国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政策，使其为越渐嚣张的侵犯态度（尤其是在东亚地区）付出代价。但这种做法也会危及到美国利益。对于那些陷入其中的纠纷国而言，好处非常明显：控制更多领地，提升国家力量，树立国际威望，扩张领海权，获取资源。对比之下，美国的利益则不是那么明显。华盛顿方面当然希望是由盟友而非对手来控制领海权利和资源开发，而且美国也希望维护有利的国际规则，即航海自由和和平解决争端。但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利益会驱使美国愿意以战争为代价来与一个崛起中的强国作对？事态会如何发展？

美国如果削弱中国非常重视的利益，会使得双方关系更加敌对。作为回应，中国很可能会扩张军费，发展一支能与美国匹敌的空军与海军力量，在其他地区挑战美国利益。事实上，如果现在的地区争议升级为两大超级强国的对抗，这将会激化矛盾，问题将更为棘手。

此外，美国用高昂的军费开支来对抗一个远离本土的国家在长期来说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婴儿潮一代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造成的压力凸显，美国的经济领先地位最终会被削弱，财政预算会持续恶化。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美国人，都不太可能愿意牺牲自己的福利来保卫日本在钓鱼岛/尖阁诸岛和菲律宾在黄岩岛/斯卡巴洛礁的利益。而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则小得多，并且中国人也更愿意付出和冒险来捍卫国土，很多年轻学生都笃信受争议的领土本就归属于中国。

美国的插手会让事态更为危险。奥巴马政府要打的仗已经很多了，美国应该从东亚领土的混战中抽身出来。首先，美国应该意识到，东亚领导权并不是美国安全的核心，而且为维持这种主导权，中国的核心利益会受到威胁，从而更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其次，美国政府应该通过行动和言论表明他们对争议领土的归属问题不持任何立场，而且尤其要禁止任何单边或联合军事行动。第三，美国不应该对争议领土做安全保障。美国在乎的是日本的独立自主，而不是对一块没什么意义的小岛享有控制权，对菲律宾也是一样。将军事力量投入到并不关乎自身存亡的国家的边界上已经够糟糕了，而对一个有着核武装的国家进行战争威胁简直就是愚蠢，而且后者还可能最终获得对有争议岛屿的归属权。第四，美国政府还应允许事态的自然进展，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邻国对其扩张态度的不满情绪增加。对美国来说，让中国面对实力逐渐上升的、得到美国军事支持的区域联合，

要好过直接挡住中国的路。第五，美国官员应该提高协商的效率，他们应表达清楚，美国的目的是不是打败中国，而是强化区域和平稳定。搭建双边或多边对话或许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中国同意的前提下搁置主权争议，联合开发资源并进行海洋治理。最后，美国要强调和平对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好处。和平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加入世界舞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应呼吁各国放下剑拔弩张的态度，争取和平解决争端。

对话和协商通常是有效的，即使是面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就算谈判不管用，美国也没有必要诉诸战争手段。大多数东亚的领土争端对美国的利益而言都是边缘性的，华盛顿方面应该坐在后排而不是冲锋陷阵。美国应该向几个世纪前的英国学习，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维护和平而不是挑起战争。

本文原题为“The Ultimate Irony: Is China the ‘America’ of Asia?”。本文作者 Doug Bandow 为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担任过里根政府的特别助理。本文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的南海战略

Dan Blumenthal, Michael Auslin 和 Michael Mazza/文 蔡云飞/编译

导读：本文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提出建议。作者认为，应当防止南海沦为中国后院。美国应当显示外交领导力，使用强势筹码，进行多边安全合作，以全球性眼光应对挑战，并明确美国的首要利益。编译如下：

1、显示外交领导力

美国应与东南亚争端国紧密斡旋，致力于为南海争端提出解决方案。如果中国拒绝参与到和平解决争端议程中来，各方应共同提出解决方案，北京方面无法否决。同时，美国应该加紧进行与北京的双边外交，使中国在对华盛顿有利的条款下坐到谈判桌上来。在外交行动进行的同时，美国应当继续坚持南海区域的航海作业自由，使得从前的暗礁不会被认为是中国新的领土。

2、使用强势筹码

美国应做好准备，运用军事力量和其他强迫性筹码来支持外交和多边安全行动。

3、参与多边安全合作

美国应该鼓励区域伙伴参与安全方面合作。由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共同进行的海上巡逻尤为重要。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应被邀请加入。

4、承认面临全球性挑战

南海争端将牵连复杂的国际问题。要想赢得国际公共舆论支持，美国必须对北京的自我辩护进行反击。同时美国也应向北约盟友解释自己的立场。

5、记住美国的首要利益是什么

美国应追求海上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方式，而不应忍受中国霸占领土。这个解决方式应与美国在南海的重要利益一致：南海应被全球共享，而不能成为中国后院。

本文原题为“A US strategy for the South China Sea”。本文作者 [Dan Blumenthal](#) 为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门主任和驻地研究员，[Michael Auslin](#) 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研究部门主任和常驻学者。[Michael Mazza](#) 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防御政策部门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对克鲁格曼反对 TPP 的回应

Lee G. Branstetter 和 Gary Clyde Hufbauer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克鲁格曼反对 TPP 的观点如下：第一，TPP 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大回报，因为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已经很低；第二，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ISDS）旨在维护跨国公司的利益；第三，TPP 中的知识产权规定有利于制药公司，不利于亟需救命的穷人。本文认为这些批判值得商榷，并进行了一一回应。编译如下：

克鲁格曼反对 TPP 的观点如下：第一，TPP 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大回报，因为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已经很低；第二，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ISDS）旨在维护跨国公司的利益；第三，TPP 中的知识产权规定有利于制药公司，不利于亟需救命的穷人。我们认为这些批判值得商榷。

1、美国的回报

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已经接近贸易自由化。美国进口某些农产品的关税壁垒很高（如乳制品，糖等），对一些进口服务几乎没有关税，比如医疗。美国对 11 个 TPP 国家的出口也是如此。TPP 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贸易壁垒，但它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十年，TPP 是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重大贸易往来的重要渠道。

克鲁格曼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能提高美国的贸易所得。但在 2013 年，美国知识产权净出口收益 900 亿美元，超过了飞机、农产品、或任何其他类别的商品的贸易盈余。更强的 IP 保护可以显著的提高这一贸易盈余，有助于美国的贸易平衡。

20 世纪末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降低了美国家庭生活的成本，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没有理由放弃 21 世纪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受损者必须通过贸易调整援助（TAA）和其他手段得到补偿。但是，国家的整体收益远远超过个体损失，调整成本绝不是反对 TPP 的理由。

2、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

克鲁格曼认为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有利于跨国公司。但该协议旨在阻止不公平待遇，并绕过腐败、无能或不公正的国家法院，它已经成为过去半个世纪成千上万的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事实上，在过去成千上百的诉讼事件中，跨国公司多数是败诉方。但克鲁格曼怀疑由于环境、安全或者金融监管，未来跨国公司会要求补偿。其实，这种怀疑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过去的协议中，适当监管的作用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楚。在未来的 TPP 中，监管的角色也会阐述得非常清楚。

当然，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确实需要改善。它需要公开诉讼阶段的所有信息，它应该为纠正不正确的决议提供上诉机制。但这些都不是拒绝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的理由，更不用说因此放弃 TPP。

3、知识产权

克鲁格曼引用了众所周知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反对 TPP 中的制药专利条款，并声明这笔交易将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负担药物费用。但事实上 TPP 对药品价格和可获得性的影响更为温和，而且协议条款中有专门保证药品可获得的规定。

世界上大多数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都不在受专利保护。甚至在美国，非专利药占处方的 84% 以上。对于专利已经过期的药物，TPP 对它的获得性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对于仍受专利保护的药物，TPP 成员国对这些药物在他们国家出售时，仍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某些情况下，TPP 会适当的保护创新型医药公司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延迟新药的仿制。但当前的国际法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专利权可以无效。TPP 支持这一规定，也即是说 TPP 成员国爆发某种流行病时，如果没有有效的通用治疗方法，该国有权利通过国际法，在合理的价格下获得受专利保护的药物。

克鲁格曼批判的条款大多都包含在美国早期的自由贸易协定内。这些条款并没有导致贸易伙伴难以获得某些药物和公共医疗卫生条件的下降，以前没有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

4、相信事实，而不是散布恐惧

克鲁格曼认为 TPP 代表了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新起点，其带来的收益将远远不如以前贸易自由化政策带来的收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TPP 中的投资者争端解决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新事物，最近的政策也无法表明上述规定会带来危险。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勇气支持 TPP，共和党也愿意与奥巴马齐心协力推进 TPP。他们的努力也受到了人们的支持，我们希望他们成功。

本文原题为“Krugman Joins the TPP Naysayers”。本文作者 Lee G. Branstetter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Gary Clyde Hufbauer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应急储备安排：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设计

Manmohan Agarwal /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2014年7月15日，在巴西福塔雷萨举行的第六次峰会上金砖国家签署成立了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CRA)，并就其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及各金砖国家的影响展开讨论。商讨论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 CRA的治理架构，2) CRA的可得资源，3) 当前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4) IMF在现有体系中的作用，5) 当前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以及6) 未来CRA在克服这些缺陷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编译如下：

1、CRA的治理架构

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CRA)的治理结构由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和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组成，每个成员国都在这两层机构中设有代表。尽管理事会可以批准新成员国的加入，但尚不明确的是新成员国是否能代表理事会或常务委员会，同时也没有清楚说明哪些国家有资格申请成为成员国。就新成员国的出资情况，这一点对于新发展银行(NDB)而言已有协议明确说明，但在CRA中则需交由理事会决定。

理事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协调工作由金砖国家的轮值主席国承担，这也意味着协调工作是一项任期较短的任务。由部长级理事会以共识决定战略性问题，而常务委员会则以共识或简单多数票决定操作性问题。

2、CRA的资源

CRA初始承诺的互换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方承诺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各成员国从CRA可获得的最大借款额等于该国承诺出资额的倍数，中国借款倍数为0.5，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均为1倍，南非为2倍。这也意味着中国可从CRA获得的最高贷款额为205亿美元，南非180亿美元，巴西、印度、俄罗斯为180亿美元。具体操作过程中，各成员国的实际贷款额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与IMF签署了贷款计划。若没有相关贷款安排，则成员国只能获得可贷款额的30%，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南非可获得的贷款额分别为30和60亿美元，而巴西、印度、俄罗斯则为50亿美元。若要进一步获得剩余70%的贷款额，成员国需要同IMF签署贷款计划。

3、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国际货币的定义以及货币供给是如何决定的；其次是当国家遭遇收支危机时可获得哪些资源以及相应的调整机制是什么，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调整对于盈余、赤字国是否是对称的？下面我们进行一一回答。

（1）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现行的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主要由各国在 IMF 的份额（quota）以及可兑换货币的存量构成。当份额不增加时，各国只有通过增加国际收支账户盈余才能积累储备。如果盈余产生于对美贸易中，那么世界美元的供应量就会上升。但若是产生于与其他国家贸易中，则世界美元的总供给量不变，只是在各国间进行重新分配。如果世界美元的供给要增加，则必定对应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其他国家整体上的盈余，这些都依赖于美国的国内政策。

与国际货币供给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不断调整以维持世界经济的活跃度。这既是当年困扰凯恩斯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后来催生出“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这一机构的动因。清算联盟可以作为全球的中央银行，但 IMF 却不具备国际经济活动稳定器的职能。尽管 IMF 可以作为各国的最后贷款人，但却无法阻止各国银行危机的爆发。以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为例，当美国、英国、爱尔兰、冰岛等国遭遇银行业危机时，若非得益于这些国家央行、政府的共同努力，那么 IMF 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2）国际收支的失衡与调整

国际收支账户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私人融资；其次是与 IMF 达成的官方融资。二战之前，私人融资是主流。但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私人资本近乎枯竭，因此在战后经济重建过程中，IMF——作为官方融资渠道，成为了各国融资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私人融资的复苏，以及 1973-74 年间国际油价的上涨，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 OPEC 国家都迅速积累了大量盈余，这使得通过私人资本市场以及债券市场融资的方式变得再度兴起。但当一国遭遇危机时，私人融资也可能面临枯竭，诸如 1982 年的债务危机以及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私人融资这条渠道不畅时，各国只能求助于官方——即 IMF 融资。

危机时期，各国的贷款需求量可能数倍于其在 IMF 的份额，这主要是由于份额的分配并没有即使跟上国际贸易和私人融资的扩张速度。此时 IMF 必须使用特殊的融资渠道，即各国可以通过要求 IMF 提出附加条款的方式获得额外的融资。

在经常账户调整上，盈余、赤字国并非对称：赤字国必须努力实现再平衡。但盈余国则无此压力，盈余国所要担心的只是过多的储备可能造成国内通胀。因此只要这些盈余国有能力稳定住国内通胀，它们几乎就没有任何调整压力，这种非对称的调整机制与凯恩斯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此外，非对称还体现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地位上：当其他国家经常账户赤字时，它们必须不断调整以避免储备不

足。但当美国赤字时，只要其他国家仍愿意接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那么美国就无需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

（3）IMF 的角色

IMF 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但自二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国际油价在 1973-74 年间也有大幅回升，这使得 IMF 的职责更多转向了维持国际储备的适度增长。这期间储备货币主要包括黄金、IMF 份额以及美元。美元可兑换为黄金，这又引发了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即当黄金开采量无法满足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张要求时，世界美元供给必须增加。这将大幅提高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而这又将削弱各国对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信心。问题的本质变为了要在世界贸易的停滞以及对美元信心的崩塌间做出两难选择。

在此背景下，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即通过提高 IMF 储备以缓解美国的赤字问题，然而这些举措遭到了美国的强烈阻挠。这是因为当份额不增加时，获得更多储备的方式只能是持有更多美元，而这又只能以持有美国政府债券或是票据的形式实现，如此一来就有助于维持美国国内的低利率，因此美国政府不会希望看到份额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尽管在美元、黄金脱钩后，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但各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疑虑依旧不减。正如 2008 年我们所看到的，危机来临时，各国纷纷选择将其他货币转为美元。总而言之，IMF 目前还无法提供一个能保证稳定增长和合理使用世界资源的框架。

（4）当期体系存在的问题

首先一点，旨在提高 IMF 份额的尝试都常常遭遇到美国的反对，这是因为当份额不增加时，其他国家扩大贸易的唯一途径就只有增持美元，而这有助于降低美国利率。这种道德风险问题意味着美国有很强动机阻止份额提高。同时任何提高份额的决议通过，都必须得到 85% 以上的支持率，而美国一国就拥有 17% 的投票权，这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同意，该决议就无法通过。

第二点是国际收支调整的非对称性。由于 IMF 贷款的附加条款常常与问题本身无关，这就使得各国不愿意向 IMF 贷款，反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积累本国储备以应对可能的收支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积累了大量的储备，这主要是因为危机到来时外国贷款很难获得，并且可能出现大量资本外逃，同时本国居民也可能将其国内资产转换为外国货币并带出国内。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多在向资本流动自由化方向努力，这也客观上将使得资本外流更为容易。这种储备的积累，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可能是合适的，但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体角度来看，却是一种严重的资源错配。这是因为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稀缺的储蓄不是被用于投资，而是作为储藏。与此相对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却可以容易地从穷国获得贷款，

而发展中国家却需要辛辛苦苦地将资本储存起来，这种资源错配会极大地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4、CRA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对金砖国家的启示

成员国可获得的贷款额与其是否同 IMF 有贷款计划紧密相关：如果有，那么贷款额会远高于无类似计划时的情形。当前巴西、印度和南非的经常账户赤字规模都远高于它们所能从 CRA 获得的贷款额。类似的，多边化清迈东亚倡议（Multilateralized Chiang Mai Initiative of East Asia, MCMI）中也会依据成员国是否与 IMF 签署贷款计划而进行区别对待。目前尚未有国家从 MCMI 项目中寻求贷款。例如，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宁可选择与美联储达成双边互换项目，也没有求助于 MCMI。

相较于 IMF 的贷款计划，CRA 的贷款期限更短：对于那些没有与 IMF 签署贷款计划的国家而言，每次 CRA 贷款时长不超过 6 个月，整个贷款项目最多可更新三次，也就是说总期限不超过 2 年。但 IMF 的贷款项目初始期就为 1 年，并且可以更新 2 次，因此总时长可以达到 3 年。

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CRA 是否会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很大冲击？答案可以说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CRA 体系并不会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对于那些遇到收支困难的国家，融资的唯一来源就是可兑换货币，而这只能通过美元实现。由于金砖国家无法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因此国际货币供给的主导权仍是在美国手中。这也意味着，尽管现在多了一种为收支账户融资的渠道，但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压力仍是集中在赤字国。

尽管 CRA 能为金砖国家提供一些额外的经常账户融资来源，但无论是从资金总额，还是贷款时限上来看，都难以满足要求的，尤其是当各国面临收支危机时。另一方面，有关其他国家是否能加入 CRA，以及加入的相关条件，这些问题都尚不明确。但无论如何，CRA 可以被视为对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垄断地位的一种尝试，并且释放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是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当前货币体系、制度改革已经有所滞后。但事实上，只有当发达国家相信 CRA 有能力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造成实质性威胁时，它们才有可能着手推动当前体系改革。

本文原题为“The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A Redesig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本文作者 Manmohan Agarwal 为 RIS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的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R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重估产出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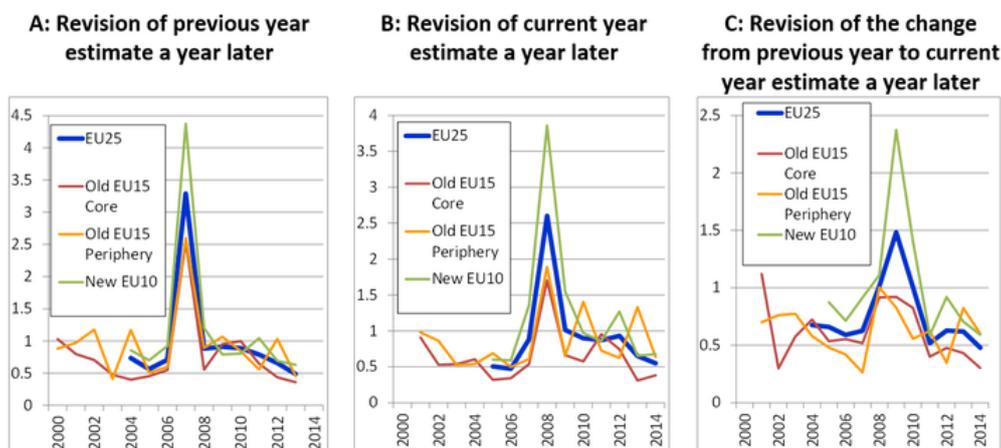
Zsolt Darvas /文 苏丹/编译

导读:产出缺口,即潜在 GDP 和实际 GDP 之差,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非常重要的指标。然而潜在 GDP 只能靠估算,无法直接观察得到。不同的数据和方法会导致估算结果的不同,因此潜在 GDP 的概念虽然清楚,但其数值未必准确。本文认为从历史数据来看,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产出缺口的修正幅度非常大,并且调整的大小和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动有关。这反映了目前估算方法很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编译如下:

潜在 GDP 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充分利用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即充分就业状态下该经济体所能生产的 GDP。这一指标反映了在该时期内的最大产出能力。产出缺口则度量了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从而反映了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程度。然而,潜在 GDP 的概念虽然很明确,但其估计出的数值未必准确。一般情况下,估算是基于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和资本数量以及对劳动力和资本的联合生产率的评估,但是不同的数据和方法会导致估算结果相差很大。本文则关注 2001 至 2015 年期间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产出缺口估计的修正。

图 1 表示的是 2001 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对产出缺口估计修正的幅度大小。由于修正的数值可正可负,本文首先计算出不同国家产出缺口修正幅度的绝对值,然后再计算出每一年的调整均值。明显可以看出,最大幅度的修正来自于欧盟委员会对 2008 年 5 月产出缺口估计数值的调整。然而,即使我们不考虑金融危机这几年的特殊情况,在其余的时间段,欧盟委员会对产出缺口估计的调整也非常频繁和剧烈,调整幅度通常在 0.5%-1.0%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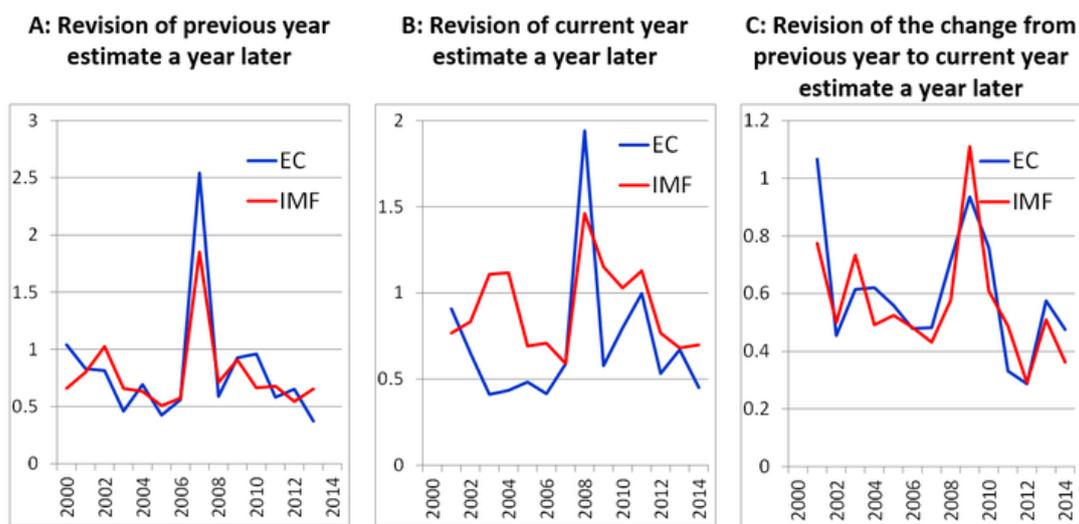
图 1 欧盟委员会产出缺口估计的调整 (调整绝对值占潜在 GDP 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 2001 年-2015 年欧盟委员会春季经济预测报告, 以及作者计算

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图 2 可以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欧盟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美国）的产出缺口估计的调整也非常频繁，并且调整幅度一般在潜在 GDP 的 0.5%-1.0% 范围之内。

图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出缺口估计的调整 (调整绝对值占潜在 GDP 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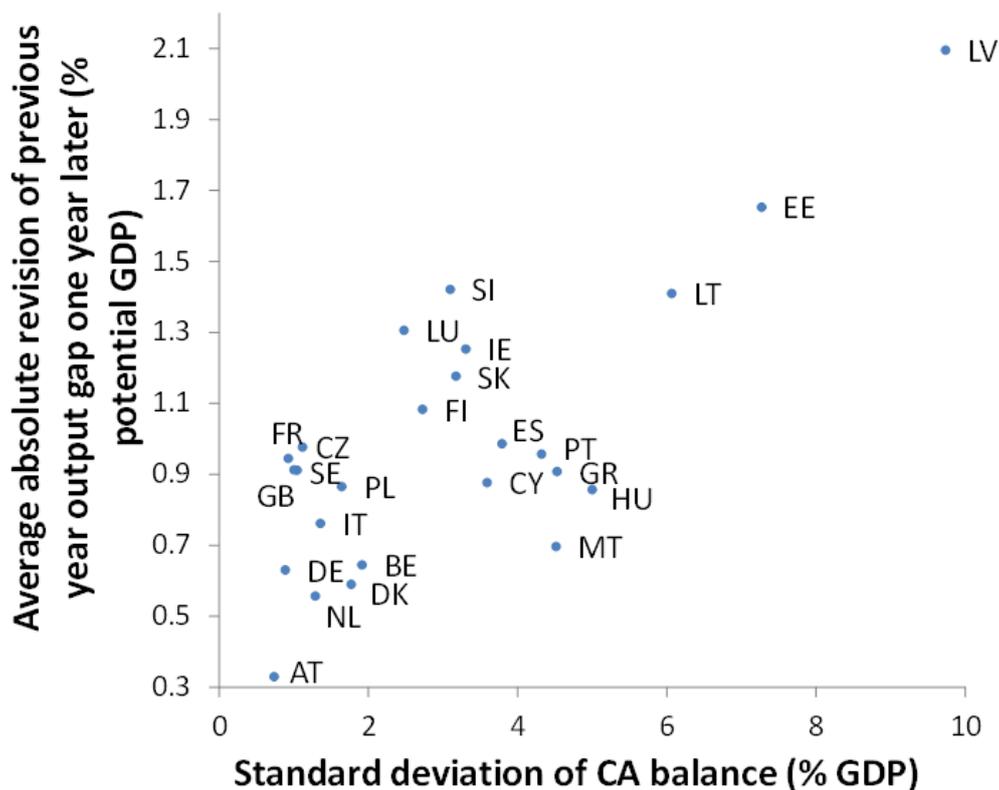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2001 年-201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以及作者计算

那么产出缺口估计的调整幅度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图 3 检验了一种可能性，即产出缺口调整的大小和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动程度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例如，在 2004-2013 年期间，奥地利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动幅度在所有样本内的国家里是最小的，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在此期间对其产出缺口估计的平均调整幅度也最小。同样地，拉脱维亚在此期间内经常账户余额变动幅度非常剧烈，欧盟委员会对该国产出缺口估计的平均调整幅度也非常大。

这一结果说明了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对产出缺口的估算方法有一定问题，估算的方法和数据中可能遗漏了关于各国潜在 GDP 的重要信息。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至少可以认为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信息。

图 3. 2004-2013 年各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幅度与产出缺口调整幅度



数据来源：2001 年-2015 年欧盟委员会春季经济预测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以及作者计算

本文原题为“Mind the gap (and its revision)!”。本文作者 Zsolt Darvas 为布鲁盖尔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Hanming Fang, Quanlin Gu, Wei Xiong 和 Li-An Zhou/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和本世纪初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相比，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本专栏采用 120 个城市的抵押贷款数据，调查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中国的房价增长率丝毫不逊于发生泡沫之前的日本，但可观的收入增长和高房贷首付比例却支持着低收入家庭对楼市的稳定参与。未来收入增长的高预期可能是房价收入比的关键驱动力，但这有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编译如下：

全球经济和政策界越来越担心繁荣长达十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飙升的房价和巨大的建设浪潮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日本在上世纪 90 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中国极可能步其后尘。现在看来，这些担心非常相关，尤其是中国经济已从过去三十年将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减速回落。然而，过去十年中国不同城市的房价究竟增值了多少？飞涨的房价是否将典型家庭排挤出房地产市场？在购房时家庭面临多大的财务负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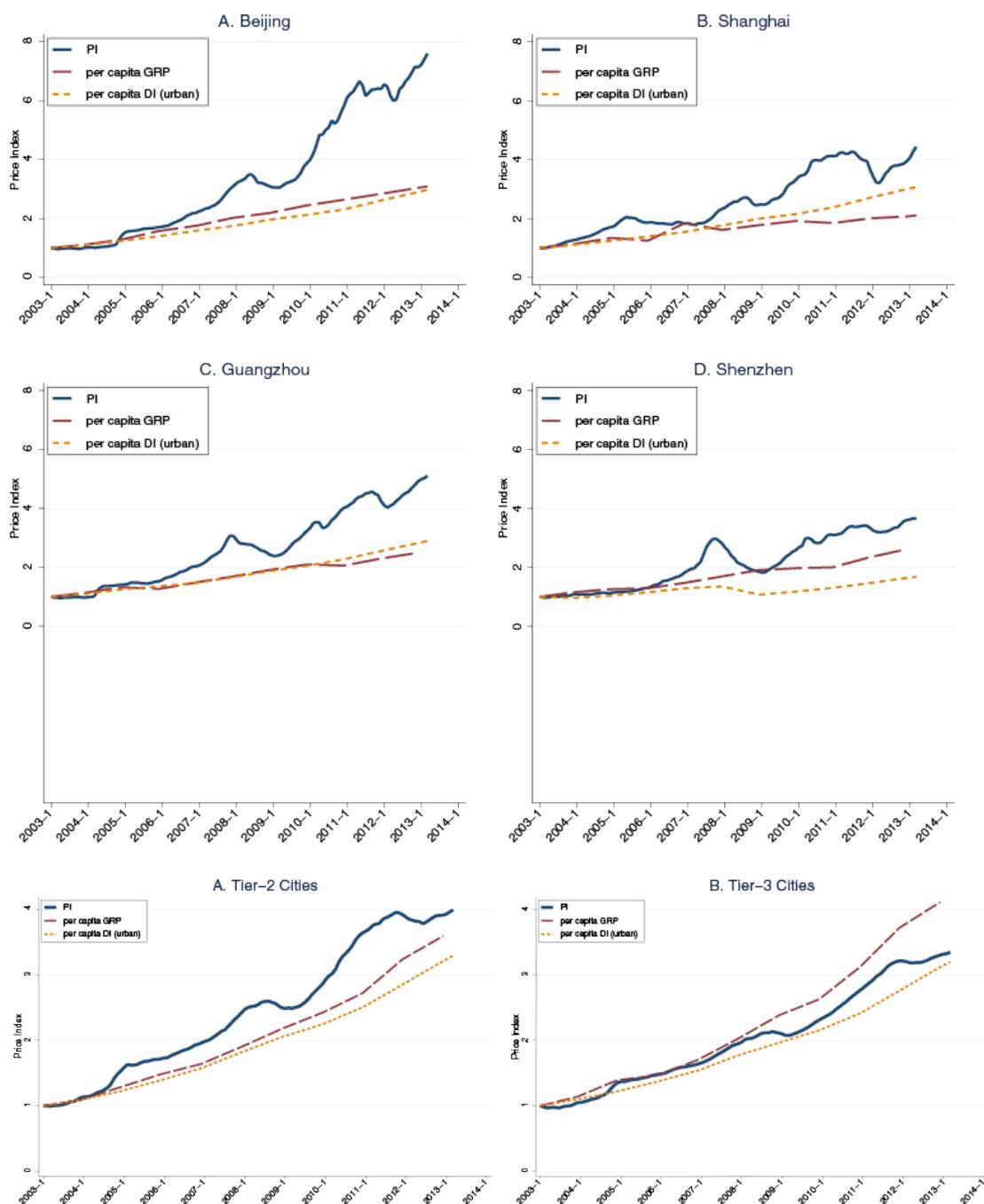
在最近的研究中，利用中国某主要商业银行发布的 2003-2013 年间的住房抵押贷款数据（Fang et al, 2015），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具体说来，我们为中国 120 个城市创建了一套房价指数，结合家庭购买力的增长，我们得以评估这些城市的房价波动，详细的抵押贷款数据也能够分析低收入家庭购房时面临的财务负担。结果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可能是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即使它可能增大中国经济突然停滞的影响。

1、房价指数

我们构建的中国房价指数可视为对著名的凯斯席勒房价指数（Case-Shiller index, 1987）的模拟，该指数建立在同一家庭重复销售的比较上。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初生特性，存在相对较少的家庭重复销售，因此无法对上述指数进行直接模拟。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房屋单元是大规模发展的典型公寓。基于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和设施便利，在不同月份出售的公寓单元可看作凯斯席勒房价指数“重复销售”的模拟。

我们的指标比中国国家统计局（NBS）发布的两种官方房价指数更可靠，因为“国家统计局 70 城市指数”相当平滑，基本无法指明过去十年中国 70 个城市的房价增长，而“国家统计局平均价格指数”没有将中国城市飞速扩张的背景下，新成交公寓单元逐步转移到城市外环的事实纳入其中（Deng et al, 2014），导致该指数质量不高。

图 1



2、2003-2013 年房价增长了多少？

我们的价格指数证实，2003-2013 年间中国的房价经历了巨大增长。我们的样本覆盖了 4 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31 个二线城市——自治区首府、省会城市或其他工业/商业中心，以及 85 个三线城市——各地区的重要城市。结果显示，在这十年中，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房价的年均增长率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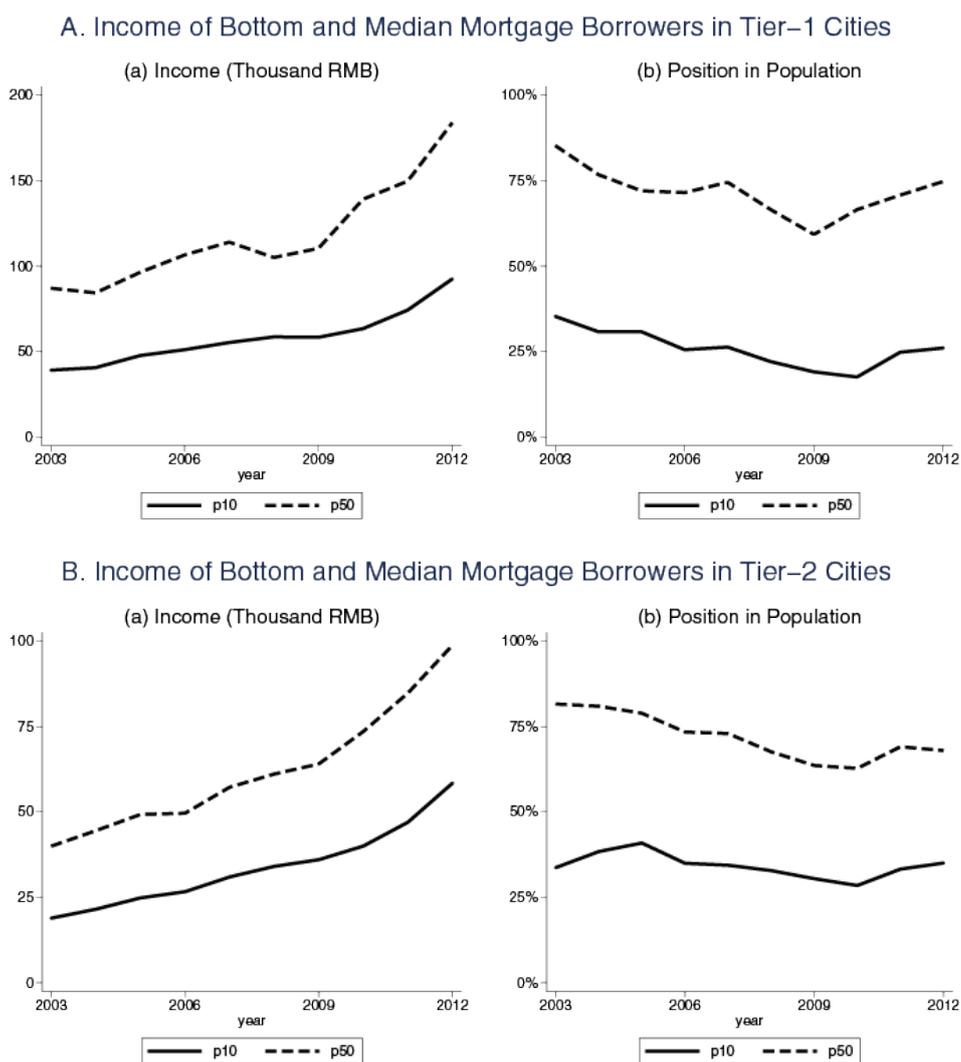
为 13.1%、10.5% 和 7.9%，远远超过本世纪初美国地产泡沫期间的房价增长速度，并与 80 年代日本房价泡沫期间的增长率相媲美。

3、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否不同？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美日房产泡沫在很多方面都不同。首先，因为中国的银行要求抵押贷款购房者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房价的 30%，这样就能有效降低银行面临的抵押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因此美国式的次贷危机不太可能发生于中国。

其次，对中国房价快速增长的强调引发了人们过度的担忧。事实上，房价高企的背后也伴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增长——十年中全国年均增长约 9%，而美国和日本的房产泡沫并没有收入增长的支撑。巨大的收入增长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提供了一些安慰，连同上述的高房贷首付比例，二者使得房地产市场不太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即将来临的金融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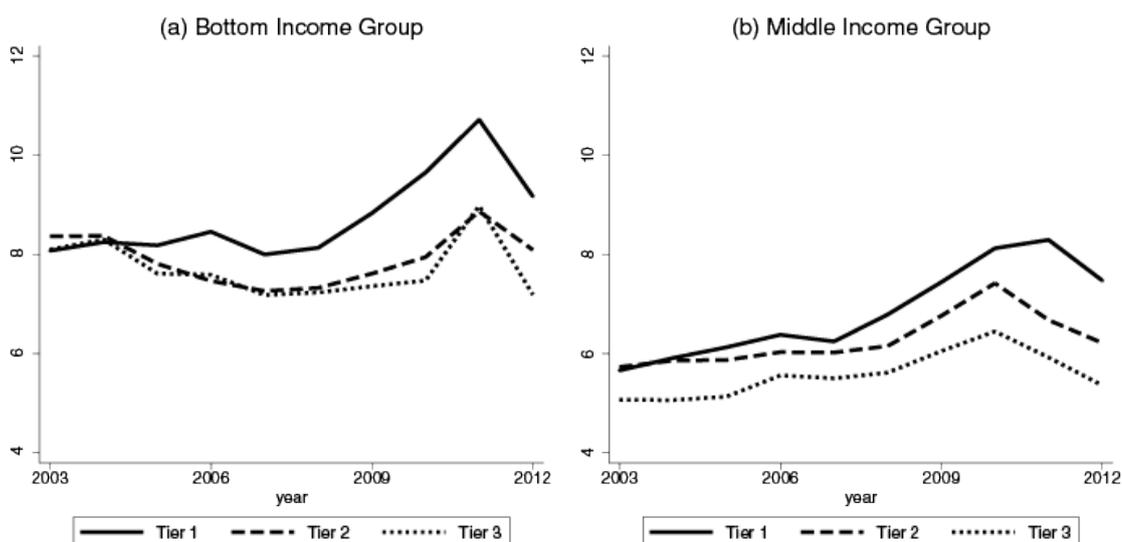
图 2 一二线城市底层和中等收入抵押贷款者收入表



4、飞涨的房价是否将典型家庭排挤出房地产市场？

尽管过去十年房价增长显著，但低收入家庭在房地产市场的参与度却很稳定。在每年每个城市的所有抵押贷款者中，我们选取了收入位于最低的 10% 部分的贷款者，分析其财务状况。通过将这些边缘购房者的收入映射到城市人口的收入分布中，我们得出了大致在一线城市分布的第 25 百分位数和二线城市第 30 百分位数上，十年间购房者中来自低收入人群的比例。

图 3



5、家庭在买房时面临多大的财务负担？

尽管低收入购房者并未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面对二三线城市约 8 倍的房价收入比（一线城市某些年份甚至超过 10 倍），他们却承受着巨大的财务负担。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家庭需要支付八倍的年均可支配收入来购房。为了获得抵押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房价的 30%（更典型的是 40%），这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 2.4 到 3.2 倍。假设一个家庭首付 40%，剩下的 60% 依靠抵押贷款，这将是其年收入的 4.8 倍，即使是温和的 6% 的抵押贷款利率，也需要家庭年收入的近 30% 来支付利息。此外，使用直线摊销法支付抵押贷款将消耗 16% 的年收入，即使按揭期限能达到最长的 30 年。

为何这些家庭愿意承受如此沉重的财务负担呢？这和他们的期望非常相关。在过去十年、二十年里，中国城市家庭收入一直稳步上升，他们便预期之后的收入也会按此速度增长。10% 的名义收入增长率下，五年后的收入将是现在的 1.6 倍，当前房价和五年后收入的比率也将下降到 5 倍。因此，收入增长率的高预期使得前述的财务负担具有暂时性。

此外，中国金融体系的摩擦也可能导致高房价。伴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惊人经济增速的是高储蓄率（见 Yang, Zhang and Zhou, 2013），但由于严格的资本管制，储户无法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而国内投资工具又非常有限，银行存款账户便成为了主要的投资工具。中国股市和债市的规模远低于银行存款账户，而存款利率特别低，普通家庭便将住房作为替代性投资工具，这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何愿意为购房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6、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

深入分析抵押贷款者的特点后，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一方面，伴随房价飞涨的高收入增长支持着低收入家庭稳定地参与到这一市场中，另一方面，过去十年房价增长和收入增长相一致，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然而，未来收入增长的高预期可能不可持续，当中国经济增长率最终回归到均值（Pritchett and Summers, 2014），特别是当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停止时，家庭的预期将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高房价收入比率有巨大的收缩空间，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放缓。

另一个风险因素在于土地过度供应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方案导致地方政府在其预算中越来越依赖土地销售收入，这可能导致了二三线城市土地的过度供应，而且也给了购房者以“房地产市场太重要而不能倒”的信念，可能引发投机性购房。因此，一项新的财政改革将会影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本文原题为“China’s housing boom”。本文作者 Hanming Fang 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Wei Xiong 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Li-An Zhou 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约翰·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

Kevin Bryan/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纳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亚伯数学奖的得主，但是本文认为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大，仅限于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论和“讨价还价”理论。为此，本文简要介绍了这两个理论相关文献的写作背景。编译如下：

约翰·纳什(John Nash)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同样著名的亚伯(Abel)数学奖，在一场不幸的车祸中与妻子同时离世。纳什的声名鹤起源于罗素·克洛(Russell Crowe)主演的奥斯卡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但是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名望并没有达到好莱坞般的追捧程度。

目前，纳什对经济学领域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其贡献非常小。他是一位纯粹的数学家，只是在其研究过程中选取了一门经济学课程，而且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时间较短。简而言之，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论，并且开创性地写了一篇有关“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重要文献，尽管此文献最终无果而终。实际上，纳什针对每个主题只发表了两篇篇幅较短的论文。鉴于现代读者对这两个主题都比较容易理解，接下来简要介绍相关论文的写作背景，而不是陈述其所得出的著名结论。

1、非合作博弈论

早在纳什之前，Robert Leonard 就开始对博弈论，也就是战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诸多有意义的观点(Leonard, 2012)。许多学者喜欢引用冯·诺依曼(von Neumann, 1928)提出的“室内游戏理论(A Theory of Parlor Games)”，并从中得出了极小化极大定理(Minimax Theorem)，但是 Emile Borel 和 Ernst Zermelo 分别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和 10 年前就已提出了同名理论，这的确也是源于相关的史前史。此类早期探索，包括冯·诺依曼与摩根斯坦(Morganstern)合著并发表于 1944 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并未对现在所说的非合作博弈或战略形势(Strategic Situations, 参与者不想串谋)进行一般性考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囚徒困境”，其虽简单但却影响深远。竞争主体(可以是个体、企业或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理性地采取对双方主体来说比其他任何策略都糟糕的行动。

回顾起来，纳什的发现其实很简单。考虑足球比赛中罚点球的例子，射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往左踢球，要么往右踢球，同时使守门员向左或向右防守。乍一看，这种情形似乎不存在均衡：如果射手向左踢球，守门员将会同方向防守；如果射手向右踢球，守门员也会转换防守方向。然而，在实际比赛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我们预期射手有时会向左踢球，有时会向右踢球，守门员的防

守方向也同样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每位球员面临的并非只有两种策略，而是混合策略的连续集合，其中每一种混合策略可简单表示为“左，右”策略的概率分布。

纳什认识到，混合策略伴随着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最优化概念，保证了在每个无穷策略博弈中都能够实现均衡，此时参与者最大化其预期效用。这一论证的核心思想是，混合策略“凸化（Convexify）”了策略空间，因此不动点定理确保了均衡的存在性。更重要的是，纳什当初用来证明纳什均衡的不动点定理现在已被广泛运用，以至于如果不了解此理论，即使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够获得博士学位。

纳什思想的发展历史同样值得关注，它与瓦尔拉斯/马歇尔经济学相反，博弈论并非派生于物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而是派生于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早期德国的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交叉的一个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讲，继萨缪尔森、冯·诺依曼和纳什之后的经济学构建了定性推理的连续方法，但这是鉴于多种原因仍然缺乏强有力的现代逻辑分析和数学分析工具的社会科学的兄弟学科。当纳什运用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证明均衡的存在性时，数学仅仅是支撑和扩展了关于非合作系统中参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思想的一种结构。而这一思想对于先前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非常熟悉的，只是苦于没有像不动点定理这样的先进数学分析工具而无法证明均衡的存在性。同样地，萨缪尔森和霍萨克（Houthakker）关于效用的思想也没有对先前研究作出重大突破，只是基于关系逻辑的明确推论，这是在进入 19 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分析工具。

纳什只将其理论应用于一个博弈案例：一个简化版的纸牌游戏，被称为库恩扑克。纳什提出的非合作解并没有立即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运用。在文献回顾过程中，非合作博弈在其被提出的最初 25 年内被排除在纯粹数学领域之外，因为当时仍需要哈萨尼（Harsanyi）提出的纯化理论（Purification Theorem）和贝叶斯均衡（Bayesian equilibria）来理解混合策略，需要运用 Reinhard Selten 提出的子博弈完全性分析多重阶段博弈，需要 Gibbard, Vickers, Hurwicz, Myerson, Maskin 和 Satterthwaite 等学者提出的机制设计理论分析机构如何影响均衡水平的结果。纳什思想不仅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其他领域中，其著作作为生物学和语言学中 Maynard Smith 和 Price 提出的进化博弈理论奠定了基础，对用于证明其他数学结论以及讨论哲学的现实意义的上下限值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对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选举行为分析影响深远。

2、“讨价还价”的解决方案

“讨价还价”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回顾纳什在攻读本科学位时所选修的经济学课程，在此课程中他提交了一篇学期论文，并最终发表于

《Econometrica》。在此论文中，他曾试图对两个参与主体针对某一结果进行“讨价还价”的情况进行公理化（Nash, 1950b）。无论“讨价还价”的结果如何，都假设它满足以下合理的假设条件：

- 因为序数效用对于效用函数的仿射变换是固定不变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不会随着此种类型函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只有序数偏好发生变化时才能影响“讨价还价”的结果；

- “讨价还价”的结果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
- 假设参与者的效用函数是既定的，那么他们应该得到对称性的待遇；
- 不相关备选方案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证明发现存在一个使 $(u(x)-u(d))*(v(x)-v(d))$ 最大化的均衡结果，其中 u 和 v 表示每个参与者的效用函数， x 表示最终议价的支付矩阵， d 表示不发生“讨价还价”情况下的“现状（status-quo）”支付。在许多情况下，这是自然成立的。但是，单值性并不总是出现；考虑埃奇沃思盒子的情况，个人理性和帕累托最优会导致许多潜在均衡点。纳什的研究结果是卓著的，也是令人惊奇的，其毕业学校给他开具的推荐信仅有一句话“这是一个天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纳什的“讨价还价”理论存在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纳什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他对纳什均衡和纳什“讨价还价”具有一种类似的双极感觉。是什么问题确实威胁到了纳什“讨价还价”理论的成立呢？其实在于，纳什“讨价还价”理论完全遵从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作提出的理论。在此，考虑两个完全相同的参与主体分配一美元的例子。假设其中一位参与者事先拥有 30 美分，因此实际上只有 70 美分在桌子中间。纳什解是事先拥有 30 美分的参与者最终拿到 65 美分，另一位参与者拿到 35 美分。但是，请抛弃这种想法。

参与者 1：“我已经拥有了 30 美分，应该得到剩余部分的一半。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如果你不给我 65 美分，我就会离开这张桌子，并且我们谁都得不到更多。”

参与者 2：“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公平的结果应该是每人得到 50 美分，这将大于你事先拥有的 30 美分，因此你可以带着你的威胁从桥上跳下去吧！”

也就是说，每人 50 美分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解，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对工资的“讨价还价”，这可能更有意义。假设企业试图雇佣一位 CEO。如果公司雇佣了两位完全相同的 CEO，那么他们会带来 50 万美元的价值。其中，CEO 候选人 1 没有收到其他的工作 offer，CEO 候选人 2 拥有一份相同声望和收入（17.5 万美元）的工作 offer。当然，我们不能相信 CEO

候选人 2 将得到更高的报酬，但这是真的吗？17.5 万美元的工作 offer 是一项完全不可信的威胁，因此它不会影响“讨价还价”的结果。

纳什本人很明白这一点，从其 1953 年发表于《Econometrica》的论文(Nash, 1953) 可以看出，他曾试图给出一个能够实现早期公理化结果的非合作“讨价还价”博弈。实际上，这篇论文激发了大量相关研究计划，被称为“纳什计划”，致力于发现能够产生著名的或者听起来合理的合作解结果的非合作博弈。在某种意义上，机制设计中的“执行 (Implementation)” 可以被认为是“纳什计划”的一个成功的现代分支。纳什于 1953 年提出的非合作博弈只是简单地在可能的结果系列中附加了噪音。粗略地来说，纳什指出，噪音分布沿着真实的“讨价还价”边界逐渐退化，参与者将确切需要他们的纳什“讨价还价”结果。当然，有意义的是，存在某个产生纳什解的“讨价还价”博弈，并且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执行合作解概念的非合作博弈的观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特殊的博弈看似非常陌生。噪音源于何处呢？为什么噪音会逐渐退化呢？等等。

然而，在纳什研究的基础上，关于“讨价还价”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三篇论文尤其值得学习：Kalai & Smorodinsky (1975)，其继承了公理化方法，摒弃了 IIA 公理；罗宾逊于 1982 年在《Econometrica》发表的关于附加备选方案的非合作“讨价还价”问题的论文 (Rubinstein, 1982)，以及 Binmore, Rubinstein & Wolinsky 对“讨价还价”解决方案的实施 (Binmore 等, 1986)。

本文建议在午餐时间读一下纳什发表的这四篇论文，以便充分了解并尊重他对现代经济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本文原题为“The economics of John Nash”。本文作者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副教授。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序

Barry Eichengreen / 文 郭子睿 / 编译

导读：本文旨在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顺序以及这些政策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谨慎的、渐进的战略来发展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并控制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如下措施：资本账户开放主要集中于长期投资者和资本流入、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和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方面。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施行的政策，未来也应该继续实施。编译如下：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计价货币、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吸引力。中国需要建立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金融市场的建立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应该采取谨慎的、渐进的战略来发展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了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并控制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如下措施：资本账户开放主要集中于长期投资者和资本流入，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以及建立离岸金融中心。

1、有选择性的资本账户开放

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起步于 2002 年实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该制度允许合格的境外投资者购买一定额度的人民币证券。2004 年开始在香港和澳门开展人民币存款业务，2006 年成立“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允许国内投资者投资海外证券投资基金。2007 年国际公司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又称“点心债”。2009 年一些公司被授权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一些海外银行也被允许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 2011 年，被授权使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公司的范围进一步扩大。2014 年 11 月，“沪港通”的实施允许内陆投资者可以投资适度规模的港股，香港的投资者也可以适当规模地投资大陆股市。

上述措施的综合结果就是有选择地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资本流入。在资本流出方面，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额度很少用完，沪港通也主要是香港投资者投资内陆市场。这说明人民币的流入和流出并不平衡，分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还需要其它相关措施。

2、离岸金融中心

促进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策略。香港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也是中国进出口的重要通道，成为第一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但中国也鼓励国外金融市场的竞争，以建立更多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一般会面临三个约束：有限的人民币金融产品；需要与中国的银行建立联系，便于清算交易；充足的人民币来源。第一个约束比另外两

个更有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台北能够成为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甚至超过香港。台北通过贸易盈余获得大量的人民币，然后使用这些人民币进行人民币放贷和投资。为了解决第二个约束，中国政府已经为不同的离岸金融中心指定清算银行。为了解决第三个约束，中国人民银行与外国央行进行大量的货币互换，以满足国外银行对人民币的需求。

这些措施加剧了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也推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离岸人民币存款、点心债发行等相关人民币活动迅速增加。中国和国外的银行也都相互受益。中国银行把国外银行的先进理念带回国内，国外银行也愿意与国内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

3、在岸自由贸易和金融区

建设自由贸易和金融区是促进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流动的另一重要途径。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和金融区（SFTZ）就是重要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清除上海与世界各国金融交易的壁垒，把上海作为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试验区，并吸引国外金融中介机构。试验区内的银行可以为跨国公司开设特殊的账户，便于其与母公司之间资金转移。此外，中国政府精简审批程序，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

与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相比，允许一些银行和企业在上海自由贸易和金融区与国外银行和企业从事跨境金融交易，更能有效促进资本流动。当然，风险也更高。自贸区内外的连通可能会降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并带来一些无法预料的结果。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谨慎地，逐步地发展自由贸易和金融区。

本文原题为“SEQUENC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本文作者 Barry Eichengreen 是 CIGI 高级研究员，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建设新丝绸之路

James McBride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美国和印度建设新丝绸之路的计划、背后不同的原因，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障碍。编译如下：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汉王朝开辟了丝绸之路，形成了一张连接南亚、中亚与中东、欧洲的商业网络。如今，新丝路计划的提出，旨在加强中、东亚之间的联系。这一概念在美国和中国都被提及，然而背后的原因却截然不同。

2011年，在美国撤军阿富汗时，美国提出大中亚经济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整合的观点，以求政治稳定。2013年，中国主席习近平断然发表其关于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的观点，从而实现贸易流水线，保证稳定的能源供给，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北京的区域影响力。

中美两国的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如在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发展能源，在巴基斯坦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当地政府实现政治影响。这是否会引发冲突还有待观察，而印度、俄罗斯等其他的亚洲实力国家也在寻求机会来实现各自主导的区域整合。这些颇具野心的计划也许会重塑亚洲，这个世界上相互协调性最差的地区之一。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与本土的竞争，物流障碍，信用风险以及政治的不确定性。

1、丝绸之路的起源

最早的丝绸之路形成于中国的汉王朝的西部扩张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形成了一张连结现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等中亚国家，南至巴基斯坦和印度，甚至延伸至欧洲的贸易网络。

中亚曾是第一批贸易浪潮的中心之一，它是连结东西方市场的枢纽，财富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宗教在这里融合。中国贵重的丝绸、香料、玉等商品被输往西方，而黄金等贵金属、象牙以及玻璃制品流入中国。这一贸易路线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以及中国的唐朝（618-907）时期达到巅峰。

但是十字军东征以及蒙古人向中亚的挺进，抑制了贸易的发展。到了十六世纪，亚欧之间的贸易大部分转移到了海上，因为海上贸易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如今，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是孤立的，他们区域内贸易只占有所有跨国贸易的6.2%。同时，这些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尤其在2014年俄罗斯出现经济困境之后汇款下降了15%。

2、美国的新丝路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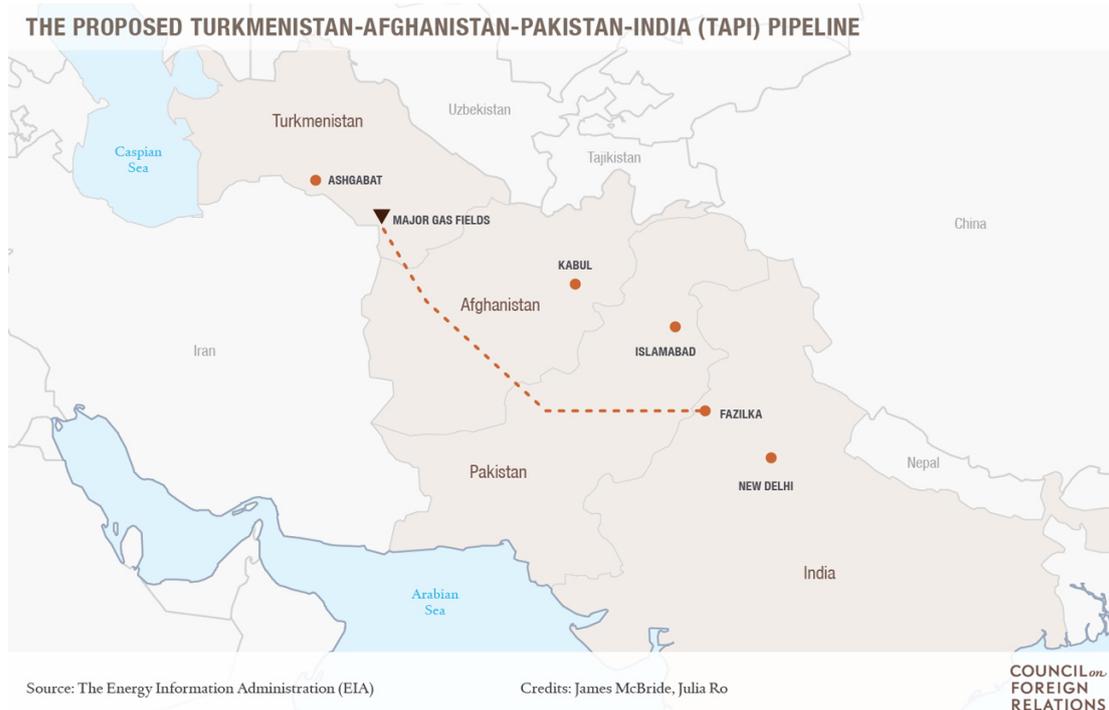
对美国来讲，新丝绸之路将为中亚带来一系列的投资和区域贸易联盟，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2009年，奥巴马政府向阿富汗增兵三万，其希望以此为基础实现几年内的完全撤军，此后华盛顿开始制定策略来通过外交手段支持这些举措。而这些计划的实现首先需要让阿富汗建立起一个无需外国援助的独立经济体。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简述了2014年的一个政策重心，美国战略的核心之一是为中亚建立一个区域能源市场。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的其他国家有超过16亿的能源需求，而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储备着足够的水电和天然气。

曾在2011年和2012年担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事务代表的前大使马克·格罗斯曼(Marc Grossman)表示，接下来的关键一步是整合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私人投资和创业项目。格罗斯曼指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潜力产业如水果和水泥等行业，目前正受到贸易壁垒的限制。

3、美国在中亚的举措

美国的政策焦点是推进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建设，从而为阿富汗经济带来好处。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TAPI将使其能源出口不止局限于中国，而向印度和巴基斯坦转移。但100亿美元的项目一再因无法确定投资者而推迟。土库曼斯坦不允许外国公司持有股权，导致西方主要石油公司都拒绝了这个项目。“这真的可以归结为土库曼政府的原因”，前美国国务院国际能源事务特使大卫·高德温说。



自 2010 年起，美国在阿富汗能源项目直接投资 17 亿美元，国务院在国家道路建设的上花费了 20 亿美元，而这与美国在阿富汗安全部队上 620 亿的开销相比只是一小部分。

2011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协助创建了阿拉木图共识，构建了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框架”。其项目包括减少贸易壁垒，提高出口能力，支持阿富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还包括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签署跨境运输协议(CBTA)。美国承诺向 CASA-1000 项目投资 1500 万美元，与中国在中亚的数百亿投资相比，这一措施效果未必显著。

4、中国的新丝路计划

中国推进丝路计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习近平主席希望展现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而“新常态”经济的缓慢增长迫使领导人为消费品和过剩的产能开拓新的市场。同时，可以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新疆的经济发展，遏制分裂势力的抬头，从而保证长期的能源供应。

中国的丝路计划分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关注陆地基础设施开发，而“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通过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海上航线。

2013 年，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讲到，他希望创造一个庞大的铁路、能源管道、公路和边境口岸网络。这样一个网络既可以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

用，也可以“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亚洲开发银行预计该地区每年面临着近 80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习近平随后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 2013 年东盟峰会上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计划。为了适应逐渐增长的海上贸易流量，中国将投资整个印度洋的港口，涉及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国。



5、中国的举措

2014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订 300 亿美元的交易，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交易达 150 亿美元，与吉尔吉斯斯坦交易额为 30 亿美元，并同时花费 14 亿美元来帮助改进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2014 年 11 月，中国宣布建立一个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

2015 年中国敲定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计划，初始资金预计达 1000 亿美元。尽管美国反对，亚投行仍吸引了 57 个创始成员，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如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美国对亚投行的消极反应突显出，美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担心，中国将削弱世界银行等西方机构，而由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影响力将逐渐增强。

而高德温认为，这些担忧被夸大了。这位前美国国务院国际能源事务特使认为，亚投行将使这些国家更加独立而不易受到俄罗斯的影响，而这是美国政策几十年来的焦点。同时，亚投行会为该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带来大量的资本，这是非常罕见的。

6、印度的区域整合计划

自 2014 年上任以来，印度总理莫迪积极寻求与其邻国的联系，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前所未有的合作。

同时，莫迪还寻求与美国的紧密联系。作为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捐赠者，印度在美国主导的行动中成为重要的支持者，仅过去十年的花费就超过 20 亿美元。

然而持续不断的领土争端使得印度和邻国之间进行更深层次的整合复杂化。自 1962 年喜马拉雅边界争端问题开战以来，中印两国一直争端不断。印巴关系自 1947 年以来一直令人担忧，他们之间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两国能否进行如 TAPI 天然气管道等合作项目受到怀疑。

向东，莫迪再次推进解决与孟加拉国的边界问题，此举可使印度成为通向东南亚的大门。印度在 2015 年 5 月与孟加拉国签订陆地边界协议，标志着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巨大进步。

印度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之一，莫迪和习近平也在建立越来越友好的外交关系，“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进展，不同寻常”艾尔斯说。

7、丝绸之路的潜在障碍

中国的雄心壮志已经遭到当地的反对。在缅甸，计划投资 200 亿美元的由昆明到皎漂的铁路由于公众的压力停滞不前。同样，斯里兰卡新当选的政府对上届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协议也在进一步的审查。

对于中美，中亚基础设施项目都面临着陡峭的山道，以及来自武装激进分子的威胁。尤其是阿富汗，经历几十年的内战和国外干预，其能否从战争转向拥抱雄心勃勃的商业项目，将对丝绸之路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

格罗斯曼认为更大的挑战来自法治。他说，“安全状况是一个挑战，但美国的 CEO 们会问是否有足够的法治保证投资。”虽然 TAPI 管道受到土库曼斯坦的阻碍，CASA - 1000 能源电网引起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担忧和不满，但法治会导致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未来。

最后，还有待观察俄罗斯在其“近郊”中亚国家的野心如何与美国和中国的努力相互作用。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降到最低点，俄罗斯一直通过欧亚经济联盟追求区域一体化，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建立经济联系。中国取代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建立能源和投资联系，也将激化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

本文原题为“Building the New Silk Road”。本文作者 James McBride 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线作者/编辑。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避免资产泡沫需要统一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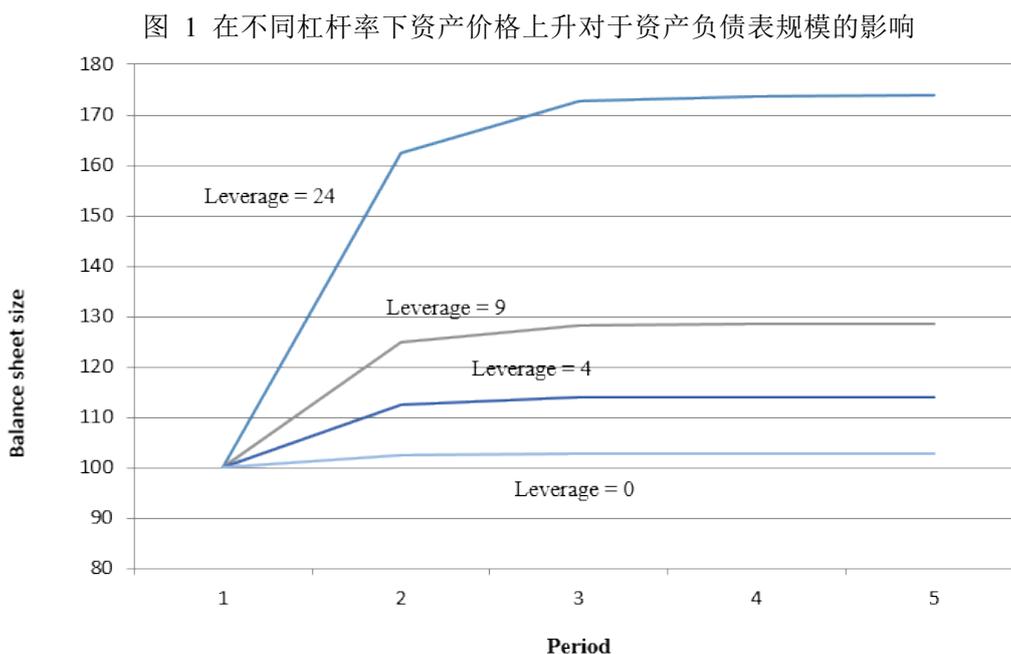
Dirk Schoenmaker /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负债融资增大了整个金融系统中资产价格波动的幅度，并且助长泡沫，因此有必要进行监管。尽管没有解决金融市场失灵的万灵药，本文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采用一个综合、连贯的宏观审慎方法加强系统的监管程度。编译如下：

主要金融机构的 CEO 们呼吁采取宏观审慎的方法控制因为低利率所造成的资产泡沫。如果不尽快推出措施，金融系统可能会因缺乏监管而失灵。有不少助长泡沫的因素。其中，最基本的是在风险较小的时候使用杠杆操作最大化收益。比如 2007 年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房贷快速增长而发生的。金融机构不必承担杠杆操作对于资产数量和价格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一个正反馈效应——杠杆率不断攀升。因此宏观审慎政策非常有必要。目前，监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逆周期资本缓冲、限制杠杆率、限制负债比率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更加统筹的方法。

1、放大机制

我们使用了一个程式化模型来描述杠杆对于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见图 1）。假定资产价格增长 2.5%，不同杠杆率（负债/资产）对于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最终影响在图中清晰地显示，可见高杠杆率的抬升效应极为显著。限制杠杆率可以降低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增长。一些金融部门已经开始使用限制杠杆率的方法，比如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其它部门也开始对此方法进行讨论。



2、边界问题

这个在多个部门中并没有统一使用的方法增强了边界问题。资本总是向着监管松懈的部门流动。在世界经济论坛（2015）上 CEO 们就是这么说的。金融危机期间，抵押借贷就转向了监管较弱的居民抵押证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就统一监管，要么就切断部门之间的联系。后一种方法在金融领域并不适用，因为金融创新总是能够避开当前的监管。

3、统一方案

部门之间协同监管就很必要了。限制杠杆率应只应用在通过负债融资的金融部门。共同基金和投资基金这种股权融资机构应当排除在外。通过收费进行融资的机构，比如保险公司或者养老基金也不在此列。

图 2 金融系统中不同部门杠杆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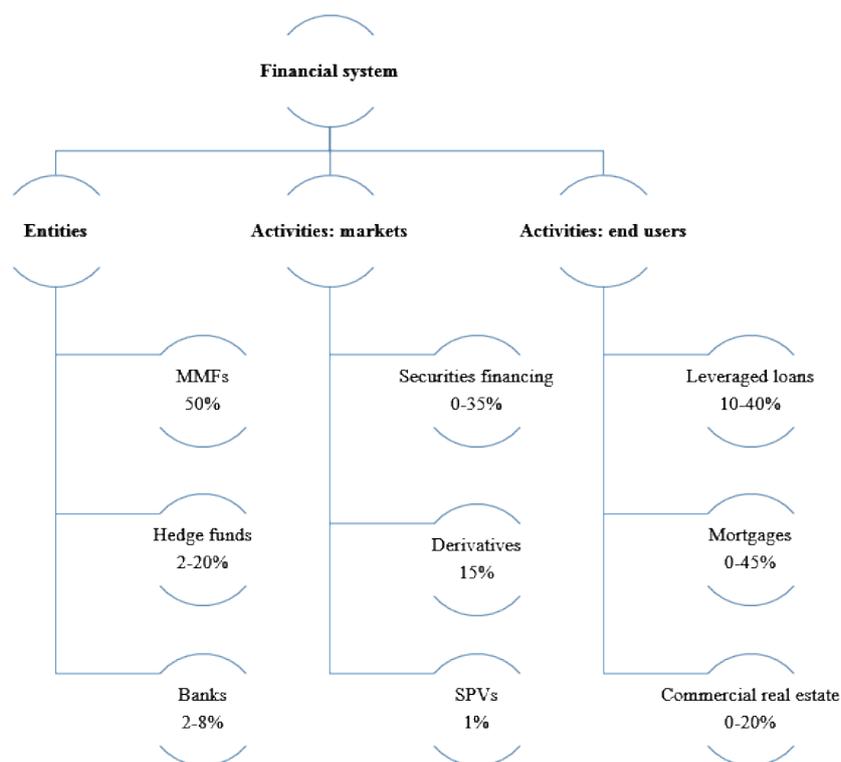


图 2 中比率为股权/资产率，包括了金融系统中重要的负债融资机构。限制一些部门杠杆率能够提高另一些部门的股权收益。

不同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巴塞尔协议 III 中，银行需要遵守杠杆率的限制。而金融市场中，证券融资交易一般都过度抵押，因为资产价格有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异就是估值折扣，也是一方进入证券融资交易所必须提供的。抵押贷款行业所使用的又称为“贷款-价值比”（定义为负债/总资产）。这些术语的含义是

相似的，一个上限为 90%的贷款-价值比和下限为 10%的杠杆率相同。宏观审慎监管的好处，相比于微观审慎监管，就在于能够协同各个部门，通过内化杠杆的内生效应阻止监管套利行为。

4、没有万灵药

尽管还没有能够完美地处理金融系统风险的方法，但我们的工作对于监管设计提出了新的设想。我们仅仅担心监管会一步一步地加强，最终导致效果一般的过度监管。

本文原题为“A unifying approach to preventing asset price bubbles”。本文作者 Dirk Schoenmaker 为德伊森贝赫金融学院金融系主任。本文于 2015 年 5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卡特在“香格里拉论坛”捍卫南海

Michael J. Green, Ernest Z. Bower, Mira Rapp Hooper/文 郭楚/编译

导读：近期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中国在南沙的填海造岛和其他军事活动表示了担忧。美国拟将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实际介入，并与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加强合作。然而，美国区别对待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的填海造礁行为令人不得不再一次看到美的双重标准。编译如下：

星期六上午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发表了关于亚洲安全问题的深思熟虑的演讲。在南海填海造岛问题越演越烈之际，卡特作为美政府代表发出了最强硬的声音。他声称，填海造岛行为是对国际惯例和美国维护国际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挑战。卡特的演讲更加引起了有关方对地区战略安全的关注，他呼吁加强地区机制建设，为亚太国家和人民在有关南海争端问题上发出声响。

亚洲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对美国来说是好事。美国提醒世人，它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卡特乐见亚洲作为撬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支点，但是也提到美国的经济正在全面复苏。他重申美国和他个人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承诺，美在亚太将部署新的军事平台，如P-8巡逻机，苏姆盖特隐形驱逐舰。同时，美国也将尽快结束TPP的谈判。卡特也重申了美国维护和维持地区规范和惯例、加强机制建设和推动联盟与伙伴关系现代化的决心。卡特传达给亚洲的信号是，他深刻理解经济是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

美国对在南海的开荒垦地持强硬立场。卡特对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是强硬而区别对待的。他提到虽然地区其他南海声索国也在建设前哨基地，但是中国走得“更远更快”且没有说清其潜在战略指向。他呼吁各方停止岛礁建设活动，和平解决争端。美国也将为声索方的国际仲裁提供支持。卡特向中国表示了美国将在国际法范围内继续在南海巡航，有飞机跑道的人造岛礁并不能赋予主权以及限制他国在国际海域和空域的通过。

在问答环节，卡特回答了三个有关中国填海造岛和美国应对措施的问题。他拒绝就中国在南海建前哨基地的长远意图进行推测。他指出是中国而非美国在南海制造了新的事端，而很多国家也跟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行为感到忧虑。

卡特回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的一个问题，这位军人指出中国在南沙的活动是合法且正当的。卡特指出，美国呼吁各方都停止这些行动，美国对地区海域和空域的巡航已长期存在并将继续存在。

指出下步努力方向。卡特提到，美国将准备与越南签订一个新的“联合愿景声明”（Joint Vision Statement）和与印度签订防务合作框架（Defense

Framework），但一个最重要的政策信息是，美国将提出一个全新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倡议”（Southeast As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这个倡议如果得到执行，在未来的几年中，五角大楼将为地区伙伴提供最多达 4.25 亿美元的援助用于能力建设。但这个倡议也面临着被扣押的限制。

在外交层面，卡特呼吁中国和东盟早日制定和签署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卡特的演讲并没有提供关于美国对南海问题战略的全面图景，而是传达出长期的战略思想。美国对亚洲和平与繁荣的贡献以及对安全和经济的投资是以更宽广的目标为基础的。卡特强调了地区整合的重要性，并且含蓄地指出了地区所有国家的犹豫不决：即它们都乐见中国的成功和安全，只要不以它的邻居的主权为代价。与此同时，卡特也承认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如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并在关于中国是美国战略中的重要部分作出了再保证。

底线问题。卡特和太平洋司令部新司令哈里斯的出现，使得美国似乎对中国在南海的高压政策会有更强烈的反击。这一战略反击的核心是，美国愿意冒更大的风险来劝阻或挫败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如在人造岛礁进一步的军事化建设或者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等。然而，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是，不知道白宫是否有与五角大楼一样的风险取向，以及北京是否能够在现在的道路上被有效劝阻。

本文原题为“Carter Defends the South China Sea at Shangri-La”。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 Michael J. Green, Ernest Z. Bower, Mira Rapp Hooper。本文刊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危机侵蚀欧盟对外政策

Dr Angelos Chrysogelos/著 高歌/编译

导读：随着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四月份访问俄罗斯，作者指出欧盟面临的希腊债务危机和乌克兰问题等危机的可能会使欧盟内部对外政策的统一更加困难。编译如下：

欧盟原本面临着两个平行发展的危机——希腊经济谈判和乌克兰冲突，但由于希腊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最近的访俄，这两个危机似乎开始往一起发展。因此不得不担心的是，希腊左翼联盟领导的政府和债权人之间的僵持不下，可能会让希腊陷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势力之中。虽然齐普拉斯并没有从普京那里得到任何能够颠覆希腊和其债权人之间的平衡的好处，这位总理还是成功地塑造了不与欧盟站在同一立场对待俄罗斯的形象。希腊总理的这次访俄对欧盟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外交政策行为体的形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成员国定位的差异

齐普拉斯并不是欧洲唯一一个想和普京取得联系的领导人。除了各国都同意的制裁措施之外，众所周知的是，欧盟成员国在处理与俄罗斯关系时都有各自的不同偏好。成员国中的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将俄罗斯视为战略威胁。其他国家，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国家，在看待俄罗斯时，则更偏向于经济和商业的视角，而淡化对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战略考量——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和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夏季斯也在近几个月会见了普京。而在三月份，西班牙外交部长马加略访问了俄罗斯，并且公开声明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没有意义的。

欧洲的政治家们和一部分媒体对齐普拉斯的访俄的批评也反映出，欧洲现如今面临的危机加剧了欧盟外交政策中已经存在的分化现象。比如，三月份访俄并声称对俄制裁无意义的西班牙外交部长，对齐普拉斯的访俄却大加批评。这类矛盾发生在欧元区危机的政治环境中：西班牙政府在今年即将到来的普选中，面临着左翼联盟政党社会民主力量党的压力。与之相类似，齐普拉斯的访俄，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在希腊延迟与债权人谈判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国内形象。

随着许多成员国（比如希腊和意大利）对俄罗斯的同情态度的上升，以及受到欧盟紧缩政策和严格的预算控制，欧盟内部想要在经济状况困顿的负面影响下保持正常一致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困难。此外，欧盟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即将于今年7月到期，关于对俄新制裁的讨论也将愈发激烈。

2、相互串联的危机

欧盟的南部和东部都面临着多重挑战，对欧盟而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想要寻求共同政策从来都是不易的，比如能源安全和北非移民等问题，而欧元区问题则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艰难。欧洲集团和欧洲理事会内的政府间谈判似乎永无止境，分散了领导人们处理外部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公众的严密监督和时常出现的激进反对党又使各国妥协的空间被压缩。波兰的欧洲议会会员雅克·萨利尤兹-沃尔斯基四月份的表态反映了现今的环境，他说道“如果欧盟南部的国家继续不理解或拒绝理解东部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南部国家将不会得到东部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谅解”。

但在历史上，欧盟各国也曾经秉持相互妥协的精神，通过审慎的谈判解决了由于成员国不同外交偏好而产生的分歧，或是相互交错的外部压力。而如今欧元区危机，特别是东部和南部成员国在紧缩问题上产生的分化，却在破坏着这种对欧盟外交政策制定至关重要的潜在政治规范。

本文原题为“Euro Crisis Eroding EU Foreign Policy”。本文刊于2015年5月15日的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官网，作者Dr Angelos Chrysseglos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是欧盟外交政策、欧洲政治等。[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普京的阴晴不定

Jeffrey Mankoff/文 郭楚/编译

导读：新俄罗斯计划被放弃、俄宣布和平时期的军人死亡数为国家秘密、谴责美国非法干涉国际足联内部事务，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反映了普京阴晴不定的战略考虑。在明斯克协议逐渐失色的前景下，乌克兰危机正处在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编译如下：

自从今年2月的明斯克协议签署以来（Minsk-II），貌似缓和是乌克兰局势的主流，但是这样的状态或许将不会持续太久。缓和让位于再次内战还是全面的外交解决尚需时日有待观察。俄罗斯经济踉跄前行，普京看来意识到了需要寻求一个新的解决办法。

但最近几个星期来自莫斯科的信息是混杂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5月20日宣布克里姆林宫的新俄罗斯计划(Novorossiya project)已不存在。这是一个普京援引自沙俄时期的概念，这个概念中的俄罗斯包括今天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虽然普京的这个愿景没有得到进一步规划和展开，但是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个计划意味着俄罗斯肢解乌克兰、公开挑战战后强调主权和边界神圣的国际秩序。

承认新俄罗斯计划的失效能作为外交解决危机提供一个途径。明斯克协议呼吁外界武装势力和装备撤出冲突区域，由基辅当局恢复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与俄罗斯边界的管制。终止新俄罗斯计划和俄罗斯停止对所谓“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是明斯克协议的一部分要求，美国和欧盟也将此作为解除对俄制裁的必要前提。

新俄罗斯计划的破产的时机也具有潜在重要意义，因为它发生在克里国务卿在索契与普京以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5月11日会面之后。克里的访问成果还不算合格的作业，甚至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还感到沮丧，因为这看起来像普京的一个公共外交策略（克里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甚至没有提到克里米亚，而俄罗斯利用这一点传达出美国本质上接受了俄对克里米亚半岛拥有主权的信息）。尽管如此，克里的访问还有可圈可点的一面，因为这促成了新俄罗斯计划已经像托洛茨基曾经描述的那样成为历史的灰烬。尽管这种可能性是敞开的，但是俄内部局势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容乐观。新俄罗斯计划虽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是俄乌边境仍部署着俄大量军力。

与此同时，普京在5月28日签署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将俄军人在和平时期的死亡数列为国家秘密。换句话说，既然俄积极否认其军队介入了在乌克兰的战争，那么任何关于这些所谓在乌军队的所谓军人伤亡的讨论在现在看来就是一种犯罪。边界上部署的大量重型武装、没有标志的军队，加上关于对军人死亡率

讨论的定罪，这些都加大了俄新军事部署的可能性——不管新俄罗斯计划是否存在。

普京 28 日甚至还谴责 7 名国际足联高官被捕一事，指责美国试图阻止现任主席约瑟夫·布拉特连任，插手国际足联内部事务。普京认为因为布拉特回绝了美国关于不要让俄罗斯承办世界杯的要求，所以美国意图将其拉下马。对普京来说，优秀的运动员是伟大国家的象征。没有比失去承办世界杯的权利更能让国家领导人丢脸的事。当然，一些美国参议员确实向国际足联呼吁，鉴于俄对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的占领，不要把世界杯的承办权让给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真的想恢复在乌克兰的进攻态势，这样的论调将会更多更响，乌克兰危机的溢出效应将会更大。在西方看来，关于国际足联的戏剧性事件看来掩盖了俄在乌战争的重要转向。随着明斯克协议逐渐失色，普京面临着命运抉择，一是加大对乌的武装介入，这也将给俄乌两国带来重大后果；二是在这个问题上竭力探索战略出路。俄乌两国都面临着一个长期、炎热的夏天。

本文原题为“Putin’s Mixed Signals”。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 Jeffrey Mankoff。本文刊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

简介：AEI 成立于 1943 年，是一家私人的、非党派、非盈利机构，从事政府、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和教育。AEI 的目的是通过从事与当前最重要之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为领导人和公众服务。AEI 下设七个研究部门：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政治与公共舆论、教育、健康、能源与环境以及社会与文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AEI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7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10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9 名。

网址：www.aei.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 2005 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 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6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9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 1977 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 1921 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 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4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6 名。

网址：<http://www.cfr.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 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1 名。

网址：<http://csis.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 1981 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http://www.iie.com/>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IS)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

简介：RIS 是印度外交部所属的独立智库，专注于国际经济问题及发展合作方面的政策研究。它还承担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能力建设及开展有效政策对话的论坛职能。RIS 的工作计划旨在促进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各种论坛的多边磋商提供支持。RIS 也为印度政府与合作伙伴缔结全面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提供政策分析。

网址：<http://www.ris.org.i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